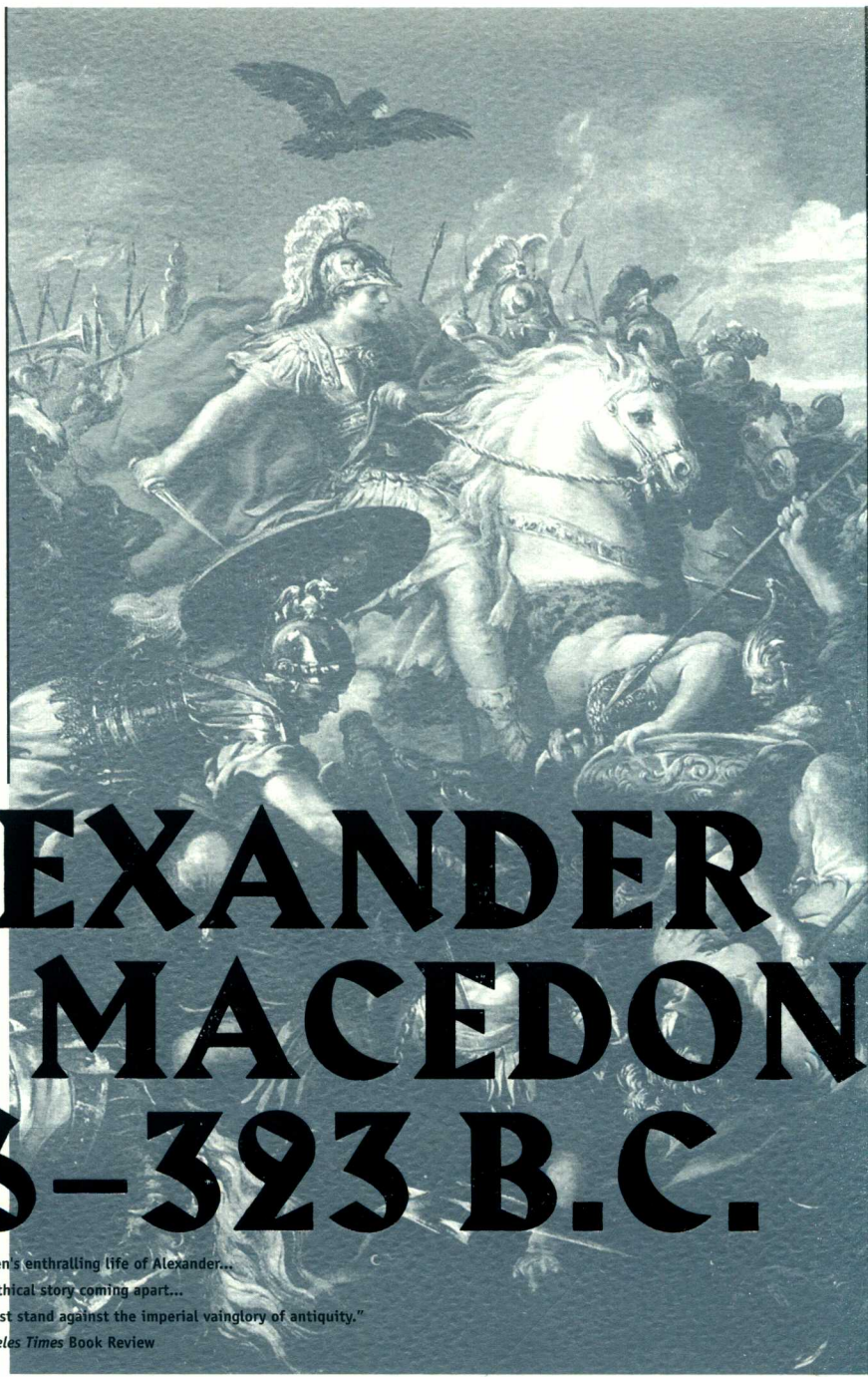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英」彼得·格林——著 詹瑜松——译



ALEXANDER OF MACEDON 356-323 B.C.

"As one reads through Peter Green's enthralling life of Alexander...
one feels every strand of the mythical story coming apart...
Green takes a very bold revisionist stand against the imperial vainglory of antiquity."
—Christopher Hitchens,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PETER GREEN

后浪出版公司

A HISTORICAL BIOGRAPHY

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
AND A FOREWORD BY EUGENE N. BORZA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从古希腊到现代史学



ALEXANDER OF MACEDON 356-323 B.C.

PETER GREEN

A BIRTHDAY
RECELEB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XFORD

「英」彼得·格林——著 詹瑜松——译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As one reads through Peter Green's enthralling life of Alexander...
one feels every strand of the mythical story coming apart...
Green takes a very bold revisionist stand against the imperial vainglory of antiquity."
—Christopher Hitchens,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ALEXANDER
OF MACEDON
356–323 B.C.**

A HISTORICAL BIOGRAPHY

**PETER
GREEN**

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
AND A FOREWORD BY EUGENE N. BORZA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京·

后浪出版公司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 (英) 彼得·格林著 ; 詹瑜松译.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3 (2018.5重印)

ISBN 978-7-5139-1842-8

I. ①马… II. ①彼… ②詹… III. ①亚历山大大帝 (前356-前323)-传记 IV. ①K835.4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5542号

ALEXANDER OF MACEDON, 356-323 B.C.:A Historical Biography © Peter Green, 1991

This edition arranged by Peter Green c/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2018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简体中文版由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版权登记号: 01-2017-8937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MAQIDUN DE YALISHANDA

出版人: 许久文

著者: [英] 彼得·格林

译者: 詹瑜松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王越

特约编辑: 史文轩

编辑统筹: 张鹏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营销推广: ONEBOOK

封面设计: 蔡佳豪 www.behance.net/tsaichiahao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十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编: 100142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655mm × 1000mm 1/16

印张: 34

字数: 505 千

书号: ISBN 978-7-5139-1842-8

定价: 11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ποῦ εἶναι ὁ Μεγαλέξανδρος;
- ὁ Μεγαλέξανδρος ζεῖ καὶ βασιλεύει

——亚历山大大帝在哪里？

——亚历山大大帝活着并统治着。

——中世纪希腊谚语

Ἦδέως ἂν πρὸς ὀλίγον ἀνεβίουν, ὧ Ὅνεσίκριτε, ἀποθανών, ὡς μάθοιμι ὅπως ταῦτα οἱ ἄνθρωποι τότε ἀναγιγνώσκουσιν. εἰ δὲ νῦν αὐτὰ ἐπαινοῦσι καὶ ἀσπάζονται, μὴ θαυμάσης; οἴονται γὰρ οὐ μικρῶ τινι τῷ δελέατι τούτῳ ἀνασπάσειν ἕκαστος τὴν παρ' ἡμῶν εὐνοίαν.

奥涅西克里托斯，如果我死后能活过来一小会儿，看看那时的人们是如何诠释现在这些事情的，那么我会很开心的。如果现在他们赞美并欣然接受这些事情，不要惊奇；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为这是取得我的青睐的上好诱饵。

——亚历山大大帝，引自卢奇安的文章《如何书写历史》第40章

前 言

在一篇发表在爱荷华古典协会的新闻通讯中的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自传性访谈里，彼得·格林曾形容自己为“本质上我是一位作家”。他接着引用哈姆雷特对“您在研究什么，殿下？”这一问题的回答，哈姆雷特回答说：“言语，言语，言语。”就是言语！对格林来说，不仅是英语，还有拉丁语、古代和现代希腊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他在著名的卡特豪斯公学接受古典学的训练，但是二战期间他在英国的远东军队中服役数年，这打断了他的正常教育。战争结束时，他成为了剑桥三一学院古典学系的研究生，在那里他于195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时候，他为古典学专业的僵化而感到幻灭，于是格林决定回到他最爱的文学世界（据说他六岁时就把丁尼生的《国王的叙事诗》全部读完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位文学批评家、影评人、电视解说员以及古代和现代文学翻译家。由于早年对希腊的热爱，他携全家离开英国到累斯博斯岛定居，在那里他专心翻译法语和意大利语著作，同时也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最终，他加入了雅典年岁学院，教授希腊和拉丁文学以及古代史，于是重新唤醒了对他先前放弃了的东西的热爱。1971年，他移居美国，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得到了一个终身教职，此后他一直在该机构服务直到退休。在得克萨斯，他指导过许多研究生的学习，并且是一位成功的本科生任课教师。1997年，他以杰出的荣休教授的身份从大学中退休，这时他迁到爱荷华大学去和他的妻子卡琳（Carin）团聚，当时他妻子是那里的古典学系的一员。自此以后，他成了爱荷华大学古典学系的兼职教授，同时还担任爱荷华大学的古典学期刊《古典学集刊》（*Syllecta Classica*）的编辑。

有两个彼得·格林。一个是古典学者，在希腊史领域笔耕不辍，创作

过针对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文学批评，并因其将几位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语而受到高度赞扬，其中包括尤维纳利斯、奥维德、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和卡图鲁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多产的操英语的古典学者之一。另一个彼得·格林是评论家和记者。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对他的艺术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不会陌生。他是《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定期评论员。他以其强大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卓然于众，例如他惊人地给二十五本（！）关于古埃及的书籍写过批评性书评，在1979年图坦卡蒙国王的展览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开幕时发表在《纽约书评》上。1981年，在辛辣地评论国家美术馆的“探寻亚历山大”展览时，他也创作了规模稍小的关于马其顿的书籍的一系列书评。在这些评论中，他不仅奉献出针对相关对象的令人深思的叙述，而且对那些站在背后、促成古代财宝到外国展览的政治力量也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来没有其他的古典学家——或许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和已故的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除外——能把文学与学术技艺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但是，格林的天分更为广泛：在他的人生中，除了是古典学者和艺术批评家外，他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和诗人（“言语，言语，言语”）。他这部卓越的亚历山大传记展现了他的两大兴趣是如何相得益彰的：格林对描绘人类境况的文学艺术的深切热爱，丰富了对亚历山大之形象的刻画，而这种刻画又是源于对古代史料的精细研读。这不仅仅是亚历山大的历史，还是一部全方位的传记（正如标题所示），意在阐释这位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的性格和动机。格林完全理解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的开场白：

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传记。那些最著名的成就未必都能很好地阐释美德或者邪恶；比起尸堆如山的战役、最为庞大的军阵和围城战，微不足道的行动、言辞和玩笑反而常常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情。因而就像画家在刻画人物时，着重面容与眼神而较少关注身体的其余

部分一样，我将更专注于灵魂的种种表征，据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而把鸿业与战功留给他人去写。

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的亚历山大传记，其中多数是为了满足大学本科生市场的课程需求。这些著作主要是重述国王的政治和军事功绩——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是历史但不是传记。有些批评者反驳说格林经常越出古代史料所允许的范围，对此他在本版的序言中有详细的回应。在其初版近四十年之后，彼得·格林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旧是对这位著名国王的最博学、最优美全面的现代评述。

尤金·N·博尔扎

古代史荣休教授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012年版序言

去年我的被题献人去世，随后他的《论亚历山大大帝文集》（*Collected Papers on Alexander the Great*）最终出版，这两件事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契机，让我得以回顾自1991年以来本书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学术洪流中幸存下来的。当我经过深思熟虑，故意模仿艾略特（T. S. Eliot）把 *il miglior fabbro*（“更卓越的匠人”）附加到献辞上时，普遍的反应是我明显没有理解艾略特事实上有多么获益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庞德为他的《荒原》（*The Waste Land*）做了全方位的编辑工作。相反，我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也知道恩斯特·巴迪安多么耐心和全面地审阅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显然，要是我先前没有发现恩斯特的文章，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在那些文章中——正是这些文章驱使我首先跟他取得联系——恩斯特在方法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史学方面他比我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其他一般理论都更令人信服。最近在本传记初稿完成约四十年后，重读这些文章，看看本书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我不禁要惊讶于它们彻底的逻辑，对支配人性的霍布斯式“现实”的悲观承认，它们把每一条古代证据都放在语境中根据常识进行分析，在形成判断时，只有将古代或现代的偏见作为历史因素时，才会对其有所让步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在本传记中，被归到亚历山大身上的政治、家庭和个人的动机，就是全然基于恩斯特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非常谨慎地得出的诸多结论。恩斯特对史料审视得极为透彻，对人们在追逐权力时所能做出的事情有着冷峻的认识——这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获得的；今天我感觉无论怎样都很难反驳那些结论，这正是对以上两点的证明。（作为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当

他听说暴徒在水晶之夜捣毁犹太会堂，叫嚣着要进行屠杀时，他还是个孩子；一直到1938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时他才和父母一块从维也纳逃到新西兰。）从一开始，对我著作的批评（据我所知，最近的是在沃辛顿的著作 [Ian Worthington, *Alexander the Great, Man and God*, 2004] 的第329页中），总是说我过于轻信古代可疑史料中的各种故事，一般认为这些故事乃恶俗、野蛮、血腥和拙劣的小说家言，并非真实历史。过去几年的历史，特别是近东和中东的历史，实际上已经使这些故事看起来相对温和了许多。古代的 *andrapodismós*（变卖为奴）和现代的种族清洗几乎毫无区别；跟已灭亡或尚存的阿拉伯各王朝相比，马其顿的宫廷阴谋并没有更加残忍、贪婪或下流，更不用说跟第三帝国相比了。

因此，尽管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有益成果，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本传记的基本论点：亚历山大是一个在军事方面才华横溢的着魔之人，痴迷于征服事业；随着一个个无与伦比的胜利接踵而来，他迷信般的自恋很容易就滑入妄自尊大和升格为神的幻想之中；为了获得至尊地位，他在内部与马其顿的权势贵族不断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了整个的亚洲远征，其残酷不亚于希特勒；他洗劫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财宝，然后用这些财宝来大规模地讨好疲乏的军队，由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他对反对他的阴谋的猜疑日渐增长，验证了那句古老的箴言，即猜疑之人总有可猜疑之事；到了他短暂一生的末年，他的目标与他所领导者的目标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以致他一死他所制定的每一个计划，无论军事的还是其他的，统统被取消掉，可以说就是一夜之间的事，而且此后再也无人提起。

不可避免地会有人想把这种冷峻的形象修饰一番。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所写的关于亚历山大的作品醒目地题作《亚历山大大帝——对一种新的过去的探寻》（*Alexander the Great: The Hunt for a New Past* [2004] ）。此书明显理智而稳健，在书中卡特利奇反对所谓的巴迪安式的“冷嘲热讽”，而支持塔恩（W.W. Tarn）的“相信人类团结的空想家”的说法；他强调事实很明显，亚历山大几乎是唯一一个“想要在一种永久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把希腊人与东方人的合作推广到各个角落的人”（第338—339页）。但是，事实上这种举动是迫在眉睫的，正如其动机是非

常实际的：征服者需要军队，而对马其顿人的持续疏远意味着亚历山大必须往其他地方去征募新兵。有些姿态，譬如苏萨的集体婚礼（不幸的是，这让我想起了文鲜明 [Sun Myung Moon] 牧师为统一教而举行的类似的公共婚礼），就意在为未来的远征军提供有意愿的军人，目的在于把亚历山大所期望的波斯—马其顿混合体，打造成一个一直处在运动之中的军人社会。

另一方面，恩斯特革命最杰出的继承者布赖恩·博斯沃思 (Brian Bosworth)，就其整体而言亦是当前最好的亚历山大历史学家，他则强调亚历山大对屠杀的纯粹喜好；在《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 (*Alexander and the East: The Tragedy of Triumph* [1996]) 中，他把相关记载与中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屠杀做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亚历山大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杀戮和指导杀戮，大概杀戮是他最擅长的事情”。(第 v 页)。这一次我要站在分歧的另一边。这种激进的简化论其实跟塔恩的理想主义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只需稍微想一下便可以知道，亚历山大的情况要比科尔特斯 (Cortés) 复杂得多。在遥远的东方，他梦想着到达大洋和世界的尽头，然而却受挫于雨季的暴雨、热带的潮湿、地理方面的致命错误、强悍的印度战士、前线的大象以及最后不堪重负的军队的抗命，于是，亚历山大心中生发一种充满愤恨和受挫的狂暴，不仅指向敌人，还指向他自己的过分膨胀的远征军（因此故意利用格德罗西亚沙漠中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来清洗商贩和其他随从人员）。自那以后，猜疑支配了他的余生。

亚历山大一向残酷无情，特别是对那些曾挫败他意志的人（他对加沙当地指挥官的处置就是明证：就像阿基琉斯对待赫克托尔那样，他把此人拖在战车的后面，但与赫克托尔不同，此人当时还活着），但其波及的范围从来没有这么广，也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地失控过。

在本传记的主要事实方面，我可以说不（当然，我可能遗漏了一些，但我不这么认为）最近的学术发展并没有表明，它们跟当前的研究相比已经完全过时了，或者急需重写一遍——这种情况自然会促使我去努力出一个新版。另一方面，这些内容总的来说并没有为新颖的研究模式所触动，无

论性别研究还是叙述学，抑或后殖民主义，这些研究模式更多地是与如何看待旧事实而非与发现新事实相关。再者，由于它们多数还处于发展阶段，当需要对证据进行评判时，它们仍然不够可靠（或者说至少容易为短期的变革所影响）。不管任何时候，要做出长久的历史判断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我可以毫不自大地说，自其在英国初版近四十年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这方面还不至于太糟；我不想把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只是一时之风尚的东西，运用于对本书主角的人生的评价，由此削弱它如今已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如今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它们可以帮助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更好更容易地理解亚历山大及其世界，这篇序言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此类读者去了解对补充本书内容特别有价值的书目。例如，在往日唯一可用的（但是对英美读者来说并不容易获得）亚历山大世界的人物志指南是两卷本的贝尔佛的《基于人物志的亚历山大王国》（H. Berve, *Das Alexanderreich auf prosopographischer Grundlage* [Munich, 1926]），但现在我们有了沃尔德马·赫克尔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各色人等——亚历山大帝国人物志》（Waldemar Heckel, *Who's Who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rosopography of Alexander's Empire* [Malden, 2006]），这本人物汇编兼具完全的学术性与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可以查阅数百个吸引人人物的资料，甚至比最啰唆的传记作家都更详细得多。最近新出的三部指南为了解过去数十年关于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参考文献，提供了便利的一般性入门指引：罗伊斯曼（J. Roisman）主编的《博睿亚历山大大帝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lexander the Great* [Leiden, 2003]）；罗伊斯曼和沃辛顿（I. Worthington）主编的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古代马其顿指南》（*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Blackwell, Oxford, 2010]）；和福克斯（R. Lane Fox）主编的以考古学为主的《博睿古代马其顿指南》（*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 [Leiden, 2011]）。

关于亚历山大远征实际过程，阿里安的叙述是我们的主要史料；现在远征的经过可以比之前更有深度地探讨下去，这得益于两部杰出的作品：

卓越的牛津古代史学者布伦特（P. A. Brunt）修订的两卷本的洛布版阿里安（Loeb Arrian [1976, 1983]），和詹姆斯·罗姆（James Romm）编的《路标版阿里安——亚历山大征远征记》（*The Landmark Arrian: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New York, 2010]）。前者提供了可靠的希腊文本，并带有经过修订的对照译文；后者则是全新的译文，并带有路标版惯有的精良的地图和照片；二者都提供了关于重要话题的极好的附录，从“拜访西瓦”到“亚历山大之死：毒杀的谣言”，全部基于顶级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我本人也大大发展了我最初关于亚历山大里亚选址和建设的观点：详情可参见我的文章《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s Alexandria*”），最方便获得的是在《从伊卡里亚到星星》（*From Icaria to the Stars* [Austin, 2004]）的第172—196页。

某些时段和地区会研究得比其他的更好一些。现在关于古代波斯和阿契美尼德帝国，我们所知道的要比半个世纪之前多得多。即使这些知识很少可以直接运用于这场因马其顿入侵而引起的最后冲突，进一步认识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所享有的广大权力和声望，也会大大提升我们对亚历山大在推倒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时所取得的军事成就的尊敬。有两部概括了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著作有着特别的重要性。皮埃尔·布里昂（Pierre Briant）的《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波斯帝国史》（*From Cyrus to Alexan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Winona Lake, Indiana, 2002]），由彼得·T·丹尼尔斯（Peter T. Daniels）翻译，既更新了布里昂原始的法文版，又订正其中的许多错误。阿梅莉·库特（Amélie Kuhrt）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时期史料集》（*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提供了所有现代史学阐释所依赖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库特本人还写过对该时期的阐述：参见她所写的《古代近东：约公元前3000—330年》（*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30 BC*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的第二卷第13章。

另一个极大得益于学者弗兰克·霍尔特（Frank Holt）的上乘研究的古代地区是巴克特里亚——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阿富汗。巴克特里亚对亚历

山大的顽强抵抗，犹如阿富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先后落入英国人、俄罗斯人和现在的美国人之手：《进入白骨之地》（*Into the Land of Bones* [Berkeley, 2005]；第2版于2012年出版），此书将古代历史和现代结合起来，透彻地说明了无比崎岖的地形、好战的部落和暧昧的忠诚，这些因素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前景，对亚历山大如此，对一心想要入侵此地的当代后继者亦是如此。五角大楼里的每一位乐观的指挥官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然后严肃地自问是否觉得自己比亚历山大更聪明，在后者远征亚洲期间从未有一个地方像巴克特里亚这样差点儿让他栽了跟头。《进入白骨之地》——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巴克特里亚》（*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 [New York, E. J. Brill, 1988]）——对任何叙述亚历山大的巴克特里亚征战及其后果的著作、特别是本书来说，都是一部基本的指南。以更为轻快但同样深入的风格写就的，是霍尔特精巧的侦探性作品《亚历山大大帝与大象钱币之谜》（*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lephant Medallions* [Berkeley, 2003]）。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总是基于他的钱币学背景，在此他巧妙地揭示出，亚历山大之所以能用宣传手段引导他疲乏的军队，关键在于他自称的不可战胜的领导力。正如霍尔特所说，“他在钱币上夸耀的领导力确实是不可超越和不可替代的”（第164页）——亚历山大死后的那些年就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然，那是另一故事了。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多年来读者们反复询问的话题，我不得不坦承有些失败。这个问题便是我在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中所处理的著名难题。人们会想起关于那场战役有两种不可调和的叙述。在阿里安所给的且得到普鲁塔克支持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在他抵达的当天下午强行渡河，并赢得了随后的战斗。而在狄奥多罗斯所用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军队等了一夜，未遇抵抗地渡过了河流，然后打了一场仗，在大部分细节上都和阿里安和普鲁塔克记载的一样。我的解决方案是假定当天下午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于是撤退，在河流下游未遇抵抗地渡河（可能是在晚上），次日赢得了像其他版本所记载的那样的战斗。我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这是非常巧妙的，但正如恩斯特马上指出而我当即紧张地记

下的，“在两种叙述之中，一个（阿里安）蓄意篡改，粗略地把第一次战斗的前一半和第二次战斗的后一半整合在一起；而另一个（狄奥多罗斯）则非常凑巧地，遗漏第一次战斗，只给了关于第二次战斗的叙述。”尽管阿里安的版本在我所假定的情况中是可以理解的，但狄奥多罗斯的却完全讲不通，更糟的是我违背了在处理史学证据时所应遵循的准则，试图在重重困难中调和两种根本对立的文本。我也无法解释矛盾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必须说一下，恩斯特在其支持阿里安版本的详尽而有说服力的文章《格拉尼科斯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Granicus*”，注释 15，见于他的《文集》第 224—243 页）中也忽视了这一问题，因而违背了他自己的史学准则之一。

这些年我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满意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不像 1991 年那样确信我的假说“绝对错了”，但是根据史料来看，我的假说依然站不住脚，而矛盾依然无解。在古代史领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证据不足要求我们承认一个特定的问题是无解的，这种情况比我们愿意承认得更多，而此处便是这样的状况。由于缺乏新的史料或更加有力的论据——未来几年也不会出现——正如戴维斯（E.W. Davis）所说，围绕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谜团仍将是谜团，而对此我们根本没有答案。

彼得·格林

爱荷华城，2012 年 6 月

1991 年重印序言

自我收拾好初步的笔记和基本的文本——阿里安、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福斯、查斯丁等的，然后退居到当时不为人知的希腊岛屿阿斯提帕莱亚岛上去创作《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现在已经二十二年过去了。我沉浸在亚历山大的学术史中，包括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和现代希腊的（作为爱国象征的亚历山大——不止是在上校军政府的统治下——值得另写一部专著），直到我觉得快要淹死了。我需要脱身一下，清理一下我的脑袋，找回透视感，清楚地看一看亚历山大，跳出那让人分心的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大合唱。当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宣传（有些是自发产生的）贯穿国王的一生，而且他一死就被人神话化了——其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种神话化就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

尽管如此，我最初进行叙述时的境遇还是在本书中留下了印记，正如类似的限制对琼斯（A. H. M. Jones）的出色且独树一帜的斯巴达研究（1967年）所造成的情况一样。特别是，我不得不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仔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存的史料，依靠他们现存的状态来做判断（即便最早的狄奥多罗斯也是生活在他所写事情的约三个世纪之后了），而不是去进行复杂的史源探究训练，这种史源探究是专门推断并评价现存史料所利用的更早的作家作品的学问。

作为初步的研究方法，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也就是说，做出判断经常是基于常识而非学术论证或共识；但那时候我不认为，现在回顾的时候也不认为这必然是件坏事。我所沉浸于其中的学术史——尤其是当时恩斯特·巴迪安提出非常有说服力的极简主义论点——不可避免地在身上

留下了印记（就像后来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而且住在希腊的时候，我比多数人都更清楚马其顿研究正在发生怎样激动人心的转变。但是，很大程度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然只是一部基于文本的史学尝试，另外还受惠于对希腊的地貌、气候和只有长年定居才会产生的对风俗习惯的熟悉。1971至1973年间我在本版出版前做了大量的修订，但其中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修订是在大学院系里进行的，那里可以充分接触到学术文献。做此修订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以补充初稿中经常忽略的学术背景和争论。

结果便形成了一部有趣的混杂之作。由于一些与文学或史学都无关的原因（版权纠纷、出版商之间的分歧），本书只作为一本厚厚的平装书在英国问世，此后——因为此版很快就脱销了——像一个学术幽灵一样存在了几年，之所以没有被人不公正地遗忘，只是因为少数学者发现了我的研究的价值，引用并向他们的学生推荐了本书。不幸的是，要找到本书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在过去的十六年里，重印的念头一再出现，但直到现在这个念头才最终有了结果，只是有人觉得实际上已经太迟了。

由于已过去了很长时间，亚历山大研究自1974年以来也在不断发展，在过去一两年里，我的想法逐渐倾向于在第二版中做一次相对彻底的修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我准备编写的这一文本。任务十分繁重，很可能——我还有其他事务——要花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许多领域已经完成大量研究，我需要加以了解。最明显的例子是马其顿史，由于博尔扎、考克威尔（Cawkwell）、埃林顿（Errington）、格里菲斯（Griffith）、哈蒙德（Hammond）和沃尔班克（Walbank）等学者的工作，以及安德罗尼科斯（Andronikos）在维吉纳大墓（Great Tumulus of Vergina，现在已确认是古代的埃盖，正如哈蒙德早就预测过的）中所取得的著名考古发现，这个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海伦·桑启西-威尔登堡（Heleen Sancisi-Weerdenburg）、苏珊·舍温-怀特（Susan Sherwin-White）和阿梅莉·库特等学者对波斯和其他东方档案的最新研究，阐明了亚历山大的东方联系和帝国管理制度。铭文得到重新解读，钱币得到研究，地形图得到修订；军事后勤这一大块问题也因我从前的学生唐·恩